

中国人的

德行

傅斯年

著

一部真正考量国民人格的经典读本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中国人的

德行

傅斯年
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人的德行/傅斯年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2011. 11

ISBN 978-7-5008-5075-5

I. ①中… II. ①傅… III. ①社会科学—文集 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27307 号

中国人的德行

出 版 人 李庆堂

责任编辑 傅 娉 左 鹏

责任校对 赵贵芬

责任印制 栾征宇

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(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编: 100120)

网 址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

电 话 010-62350006 (总编室) 010-62379038 (社科文艺分社)
010-62005038 (传真)

发行热线 010-62383056 62005042 (传真)

读者服务 010-62389465

经 销 各地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2

字 数 280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35.00 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

第一部分 中国人的心气

心气薄弱之中国人 / 002

中国狗和中国人 / 005

多言的政府 / 008

天朝——洋奴——万邦协和 / 012



第二部分 社会与政治

社会的信条 / 018

一段疯话 / 020

随感录 / 023

新生活是大家都有一份的 / 029

时代与曙光与危机 / 032

政府与提倡道德 / 046

地方制度改革之感想 / 050

公务员的苛捐杂税 / 053

政治之机构化/ 058

现实政治/ 063



第三部分 事业与职业

自知与终身之事业/ 070

青年的两件事业/ 072

文人的职业/ 077

青年失业问题/ 085

所谓“国医”/ 090

再论所谓“国医”/ 094

医生看护的职业与道德的勇气/ 108

护士职业与女子生活理想/ 112



第四部分 思想与人生

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/ 116

《新潮》发刊旨趣书/ 124

去兵/ 128

万恶之原/ 138

破坏/ 143

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/ 145

“五四”二十五年/ 151

人生问题发端/ 155

随感录/ 167

美感与人生/ 169



第五部分 文学与教育

文学革新申义/ 180

目 录

怎样做白话文？ / 191
中国文艺界之病根 / 204
思想和语言——一个文学界说 / 206
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文学 / 210
译书感言 / 215
盛世危言 / 223
教育崩溃之原因 / 230
教育改革中几个具体事件 / 236
改革高等教育中几个问题 / 241
再谈几件教育问题 / 247
大学研究院设置之讨论 / 254
论学校读经 / 259
漫谈办学 / 264
台湾大学选课制度之商榷 / 267
台湾大学与学术研究 / 276
大学宿舍问题 / 290
“国立”台湾大学第四次校庆演说词 / 299
几个教育的理想 / 304
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 / 309

第一部分

中国人的心气



心气薄弱之中国人

当年顾宁人先生曾有句道理极确、形容极妙的话，说“南方之学者，‘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’；北方之学者，‘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’”。到了现在，已经二百多年了，这评语仍然是活泼泼的。

我也从《论语》上，找到一句话，可以说是现在一般士流里的刻骨的病，各地方人多半都如此——仔细考究起来，文化开明的地方尤其厉害——就是：“好行小慧。”

什么是大慧，什么是真聪明，本来是句很难解决的话。照最粗浅的道理说，聪明是一种能力，用来作深邃的、精密的、正确的判断，而又含有一种能力，使这判断“见诸行事”。并不是外表的涂饰，并不是似是而非的伎俩。

但是现在中国士流里的现象是怎样？一般的人，只讲究外表的涂饰，只讲究似是而非的伎俩。论到做事，最关切的是应酬。论到求学，最崇尚的是目录的学问，没道理的议论，油滑的文调。“圆通”、“漂亮”、“干才”……一切名词，是大家心里最羡慕的，时时刻刻想学的。他只会“弄鬼”，不知道用他的人性。他觉着天地间一切事情，都可以“弄鬼”得来。只管目前，不管永远；只要敷衍，不问正当解决办法；只要外面光，不要里面实在。到处用偏锋的笔法；到处用浅薄的手段。

本来缺乏作正确判断的能力，又不肯自居于不聪明之列，专作质直的事情，自然要借重“小慧”了。觉得“小慧”可以应付天地间一切事情，无须真聪明，就成了“小慧主义”了。世上所谓聪明人，一百个中，差不多有九十九个是似聪明。似聪明就是“小慧”。惟其似聪明而不是聪明，更不如不聪明的无害了。

何以中国人这样“好行小慧”呢？我自己回答道，“小慧”是心气薄弱的现象；一群人发行小慧，是这群人心气薄弱的证据。中国人心气薄弱，所以“好行小慧”；就他这“好行小慧”，更可断定他心气薄弱。现在世界上进步的事业，哪一件不是一日千里！哪一件不用真聪明、真毅力！哪一件是小慧对付得来的！——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！

人总要有主义的。没主义，使东风来了西倒，西风来了东倒，南风来了北倒，北风来了南倒。

没主义的不是人，因为人总应有主义的。只有石头、土块、草、木、禽兽、半兽的野蛮人，是没灵性，因而没主义的。

没主义的人不能做事。做一桩事，总要定个目的，有个达这目的的路径。没主义的人，已是随风倒，任水飘，如何定这目的？如何找这路径？既没有独立的身格，自然没有独立的事业了。

没主义的人，不配发议论。议论是非，判断取舍，总要照个标准。主义就是他的标准。去掉主义，什么做他的标准？既然没有独立的心思，自然没有独立的见解了。

我有几个问题要问大家：

- (1) 中国的政治有主义吗？
- (2) 中国一次一次的革命，是有主义的革命吗？
- (3) 中国的政党是有主义的吗？
- (4) 中国人有主义的有多少？

中国人的德行

(5) 中国人一切的新组织、新结合，有主义的有多少？

任凭他是什么主义，只要有主义，就比没主义好。就是他的主义是辜汤生、梁巨川、张勋……都可以，总比见风倒的好。

中国人所以这样没主义，仍然是心气薄弱的缘故。可叹这心气薄弱的中国人！

七年十二月十五日

(原载 1919 年 2 月 1 日《新潮》第一卷第二号)

中国狗和中国人

有一天，我见着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，问道，“你们训练的狗，单是外国种呢？或是也有中国狗？”他答，“单是外国种的狗。中国狗也很聪明；它的嗅觉有时竟比外国狗还要灵敏，不过太不专心了。教它去探一件事，它每每在半路上，碰着母狗，或者一群狗打架，或者争食物的时候，把它的使命丢开了。所以教不成材。”

我听了这一番话，很有点感触，何以中国狗这样的像中国人呢？不是不聪明，只是缺乏责任心——他俩一样。中国人“小时了了”的很多，大了，几乎人人要沉沦。留学在国外的成绩颇不恶——胡适之先生说，只有犹太人在美国大学的成绩最好，其次便是中国学生；至于真美国人，远不如这两种民族——然而一经回国，所学的都向爪哇国去了。大约也是遇着了母狗，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，或者争食物，所以就把已经觉悟的使命丢掉了。

中国狗和中国人同生在一个地带，一个社会以内：因为受一样环境的支配，和西洋的狗和人比起来，自必有人狗一致的中国派的趋向。和狗有同样的趋向，并不是可羞的事。所不得了者，这趋向偏偏是无责任心。

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，真要算达于极点了。单独的行动，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。为什么呢？卑鄙可以满足他自

身肉体的快乐——他只对这个负责任——至于卑鄙而发生的许多恶影响，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，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，所以不顾了。团体的行动，百人中有九十九是过度的：斗狠起来过度；求的目的便在度之外，手段更是过度的。这可就中国历年的政争证明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他以为虽过度了，于他自己无害；成功了他可抢得很多的一份。失败了人人分一份，他所分的一份也不比别人多，所以不择手段。一人得，或一团体得，而国家失的事，屡屡得见。现在“鱼行”当道固不必说了，就是前几年也有若干溢出轨道的事；若国会的解散，六年临时参议院的召集等等，都是以一团体的利害做前提，而把国家的根本组织打散。我很觉得中国人没有民族的责任心——这就是不怕亡国灭种。我又觉得中国人没有事业的责任心——所以成就的事业极少。没有私立的学校，公立的学校也多半是等于官署；没有有力的工厂；没有不磨的言论机关。一时要做事业，不过预备他交游攘臂的媒介物：一旦求得善价，还是沽出去罢！

中国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，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。专制之下，自然无责任可负；久而久之，自然成遗传性。中国狗所以如此，也是遗传性。中国狗满街走是没有“生活”的。西洋狗是猎物种，当年的日耳曼人就极爱狗，常教狗做事，不专教它跑街，所以责任心不曾忘了。中国人在专制之下，所以才是散沙。西洋人在当年的贵族时代，中流阶级也还有组织，有组织便有生活，有生活便有责任心。中国人没有责任心，也便没有生活。不负责任地活着，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。

我总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，前途希望很难说。自五四运动以后，我才觉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。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，我便不赞一词了：我对这五四运动所以重视的，为它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，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。我是绝不主张国家主义的人；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，全以责任心为基石。

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。

不过这一线光明也很容易烟消云散。若不把“社会性”用心地培植一番——就是使责任心成习惯——恐怕仍是个不熟而落的果子。

前清末年的改造运动，无论它革命也罢，立宪也罢，总有坚苦不拔、蓬蓬勃勃的气象，总算对于民族责任心有透彻的觉悟。民国元二年间更是朝气蓬勃。然而一经袁世凯的狂风暴雨，全国人的兽性大发作。官僚武人在那里趁火打劫，青年人便预备着趁火打劫。所以我以为中国人觉悟还算容易，最难的是把这觉悟维持着，发挥去。

我们自己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，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。我以为惭愧得很。我们生理上、心理上，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——为遗传性的缘故——又在“中国化”的灰色水里，浸了二十多年，现在住着的，又是神堂，天天必得和庙祝周旋揖让。所以就境界上和习惯上讲去，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，并不是彻底地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。我不曾见过一个能把新思想完全代替了旧思想的人。我们应常常自反，我们若生在皇帝时代，能不能有一定不做官的决心？学生在科举时代，能不能一定不提考篮？能不能有绝俗遗世的魄力？不要和好人比，单和阮嗣宗、李卓吾、袁子才一流败类比，我们有没有他们那样敢于自用的魄力？我们并袁子才的不成才的魄力而亦没有，那么，后人看我们，和我们看前人一样，我们现在腆颜自负的觉悟，不和当年提过考篮而不中秀才的人发生一种“生不逢时”的感情一样么？有什么了不起呢？这感情能造出什么生活来呢？

所以新思想不是即刻能贯彻了的，我们须得改造习惯。

〔原载 1919 年 11 月 1 日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六号

《随感录》（六七）〕

多言的政府

西汉文景时，鲁人申公以《诗》学负一时的盛名。汉武帝在初即位时，正是年少气壮，好侈务大，又是走儒家的一条路的，所以请了申公来，很想他能为朝廷做几个宣言，献几个计划，制几套标语。谁知这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大大与一般好说话的儒家不同。他对武帝说，“为政不在多言，顾力行何如耳！”武帝听了真扫兴，只好稍迟送他回家了。本来文景两代都是儒家与黄老明争暗斗的时候，儒家总受些压迫。武帝初即位，真个是儒家扬眉吐气的时候，真可以大大花俏一下子，然而申公偏偏这么老实。今之修庙救国论，长安王业论之柱国大儒，真要笑这老头子太不会做文章了！

汉武帝还不是一位说空话的呢！他要雪国耻，便和匈奴混战了几十年，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，设度辽将军以断匈奴左臂，到底把匈奴“抵抗”得筋疲力尽，几十年后便降中国。黄河在瓠子决了口，他便自己截堵去。他的一生虽也有不少过失，但竟然造成了中国不亡于匈奴的局面，竟把现在汉人所居的地方都给汉人站住定了。他没有空言长期抵抗，他没有空言努力救灾。申公对他还说这样话，如申公生到现在，不知更要作怎样感想呢？

中国统治阶级之喉舌——即文人——向来是好说空话的，因而中国的政治无论在如何昏乱的时候，总有一篇好听的空话。近

年来开会宣言贴标语的风气更盛，所以说空话更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，真所谓“颜之厚矣”。在“九一八”事件以前，我们最大的典礼时发宣言，简直要以全世界之前途自任，现在稽顙于国联之门，不用“一切帝国主义”一类的名词，而用“友邦”“公道”了。这样在固有文化论者，犹可说君子居安而安，履危而危，真个是国粹的大道，然而凡百庶事，又何必都大吹特吹，吹时全不想到实行，吹完登时忘记了呢？这样的把戏，出之于口，等于念咒，写之于纸，等于画符，作之不已，等于发狂。这真是一个民族智力德力堕落的象征。

现在姑举两件事为例，以论为政不在多言的道理。

第一件是所谓行都，所谓陪都。原来一国有好几个都，似乎是帝王家的风度。若在民国，只有政府所在可以称都。其时帝王时代一国数都的风气，到明清已经改了。明有南京应天府，同时便在那里虚设六部各衙门，清有盛京奉天府，同时便在那里虚设五部。即在更远各朝，也每在它的所谓陪都所谓方京置留守，可见对于没有政府的都，虽皇帝对之，也颇歉然。我想现在决不会因陪都行都而设政治分会，以数次大战而取消的东西决不会再如此容易出来。然则所谓陪都，所谓行都，当不过是“开发西府”，“恢复中原昔日文化”，若干口号下的一个藻饰一种盛典。我们何幸生此盛圣明世，稽古右文，猗欤盛哉！就是在这样的藻饰盛典上，我们也还希望付力行一下子，不必多言。行都陪都都不是一个委员会一篇计划书便能出来的，也不是修庙修陵便可将西北繁荣了的。姑无论破产的东南决无余财倾于西北的荒漠中，即令有之，而不自然的发展，如所谓沙漠种田也者，也决无维持、继续、发展之理。总要先使西北有可以发展的环境，然后人民自己可向发展的路上走。使得人民自己向发展的路上走，政府所负第一步的责任是：一、维持社会的秩序，二、澄清政治的腐恶，三、给与人民以一种苏息，四、便利交通。这个人民自行发展的

先决条件，在各地皆适用，而在活地狱的西北为尤甚。我们试问，西北军人对人民之榨取如何，鸦片烟之强迫耕种如何，西北人在这样贫困生活中所供给之赋税如何，人民生产事项之被军、政、匪兵毁坏者如何，共产思想及组织在民间乃至军中潜伏之状况如何，这样问题当局者正不容易回答罢。据自西北来说，西安数十里外简直是地狱的世界。有一个旅行者，住在一个县署里，亲身听见受拷人民的夜间苦楚，少交一元便是几十板子，迟交一天便是几百板子，而所交者非赋非税，而是迫派种植的烟苗捐。在这样的现象之下，而拜佛者梦游享乐游原上的清秋佳节，装点以杨家姊妹，好古者幻造咸阳府库，金柜石室，充实以周汉彝器，明清簿录，我诚不知我们贵国大人物痴脑筋是世上古往今来何种痲药浸过的！在这个问题之下，政府还是少说几句空计划，在最低范围之内，先做出一二件事来给人看看，例如恢复秩序，稍纾民困之类。若一直的总是空话，说自己并没有意去实行的大话，将来纵是说真话时，也要没有人相信了。

第二件是所谓建设。虽在最富的国家如英、美，若建设专靠政府便也有限了，总要靠人民自己去建设，政府不过立于从旁协助的地位而已。在穷困到极度的今日之中国政府哪有力量建设多种事业，而中国政府已往之成绩，并铁路航运都弄得这么糟，真不配再多量地去尝试国营事业。今日之政府，以人力，以财力，都不是能够“百废俱举”的。他若尽他的责任，他的建设事业第一项是建设出社会的秩序来，社会有秩序，则人民可以自己建设，不待政府去做这个，做那个。第二项是建设出官署及公务员服务之秩序来，有了这一层，然后国营事业不致一举办便沦陷为腐化的结晶品，而旧有事业，亦可在这一层的大前提之下去整顿。这都是政府本分以内的事，都是可以做到的事，都是其他大事所凭借的事。几年前北伐到了北平时，全国统一，引起人民的很大希望。而侈谈建设者，更弄了好些文章出来。从今天算来，

中国人的心气

似乎在无线电以外成就的事项很少，这些固有一部是政局不安定负责任，然而其最大的弊病似在说话太多，计划太多，开会太多，宣传太多，而过于不问实际，过于不求步骤，判了今天，国家已堕入这无底深渊中，哪里还有再说大话的颜面？且把本分内最浅近的事做出来，不必再高谈建设事项咯！

中国人真是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群！我们中国人中，尝见有时有人受之扯谎的指摘时，似乎并不充分的生气，若在西洋，则Liay一个徽号一经加之于人，恐免不了受人之掌。所以官府文章，说时本不是预备实行的。今政府之多言少行，似乎本不违背我们国粹的道理。不过，立国于现在，而这样子做，既坠落官常，又败坏民德，还是择该做能做的事，切切实实做几件，不要“危不忘安”地总是说大话罢！

（原载 1932 年 12 月 11 日《独立评论》第三十号）